

陈徒手 著

人有痛天和否

1949年后

(修订版)

中国文坛纪实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013031958

1253.5
33-2

陈徒手 著



1949年后
中国文坛纪实

(修订版)

人有病 天知否

1253.5
33-2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航

C1639132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 / 陈徒手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5

ISBN 978-7-108-04316-0

I . ①人… II . ①陈… III . ①传记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作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 ① I253.4 ②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0793 号

责任编辑 唐明星

装帧设计 康健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32.25

字 数 387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目 录

善哉 林斤澜	2
人证与史证 王蒙	4
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	10
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28
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	66
丁玲的北大荒日子	148
1959年冬天的赵树理	200
郭小川：党组里的一个和八个	218
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	284
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404
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440
浩然的历史场	466
严文井口述中的中宣部、作协琐事	480
林希翎女士	489
果戈理到中国也要有苦闷	496
初版后记	508
再版后记	513
三联版后记	515

善 哉

林斤澜

新时期到来，大家对假大空烦透了，提倡说真话。一声“真格的”，无不喝彩。向真、仿真的自然沾光，连乱真也能“炒”一阵子。

知识分子有个天职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响，是失职；若做假，是渎职，严重了还是公害。但知识分子深知说真话的难处，那不是好玩的，搭上自家性命都不稀罕，因此又有商量；真话不能说的时侯，也不说假话。沉默未必真金，可有含金量。

说真话的文字与日俱增，虽不见得势不可挡，但不可逆转，已如春水东流。捎带着泥沙俱下，草叶纠缠，暗礁回旋本不可免。

好比千百人四面坐着，同时同地同看一场球，人人是见证人。你喊了好球，他看见犯规动作，这嫌哨子吹跑了，那挑吹早了，吹漏了，吹腻了……都可以是座位不一，角度不同，人人亲眼所见，各各参差。

史家与作家，又有“英雄所见”“大略不同”。史家以为史无“如果”，不能“想象”。也有竟把“虚构”与“戏说”一同挨“嗤”。有不搞“主义”的，有不取值道德的，有拿人说事的……

有作家说：史书除人名是真，别的都是假的；小说除人名是假，别的都是真的。

电视有个栏目开头说：历史有两种，一种是理性的历史，写在史

书上；一种是感性的历史，在艺术作品里。这两种要是打起官司来呢？电视不管，或者没有官司好打，原是大路朝天，各走各边。

作家这边，生活的真实以外，还有艺术的真实。这和史家的道行不一样，再要把两个真实搅和起来，谁也搞不清。艺术的真实也许是可能的生活，也许是不可能的生活，可不可能都归属审美范围。有的作家半生蹭蹬，却不愿发生半句凄苦。一厢情愿，奉献和谐，或欢乐，或精致。这在作家，是修养，是境界，也是风格。史家若问真不真？作家倒会反问：美不美？

史家也不会给堵回去，自有法相庄严：历史是不可摧毁的，也不能抹杀，不能瞒，不能骗。还有，历史会再现。

再现在生活里。

以理性或感性再现在史书上，在艺术里，在真里或美里，不论喜剧或悲剧。果然再现了，就有震撼的力量，倒会是摧毁的手段。

阻挡真、美再现的人，你明白还是糊涂？至少要知道，你是站在庄严世界面前。这面如永远的明镜，也是永远的铁面。

在这面上辛苦工作的人，查档案，找材料，访人物。为真也为美，青灯黄卷，善哉善哉！

人证与史证

王 蒙

我在杂志上读到过几篇陈徒手写当代作家的遭际和故事的文章，对之非常感兴趣。在中国现当代，作家是一个很受注目的职业，文学曾经时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发动大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由头或借口，文学成为政治的风向标、晴雨计。作家的戏剧性经历后面隐藏着的是中国的社会变迁史，也是人性的证明。日本的电影《人性的证明》中文译名是《人证》，陈君的文章就是现当代中国的重要的人证。而且他的文章写得细，生动，材料挖得深而且常有独得之秘至少是独得之深与细，他的文章十分好读。读着读着“于无声处”听到了惊雷，至少是一点点风雷。

虽说是有所谓“既然吃了鸡蛋就不必过问母鸡”的妙论，知人论世却是中国文论的一个强大的与合理的传统。如果既能吃鸡蛋和吸收蛋的营养又能知道母鸡的由来去向，趣闻逸事，秘辛隐痛，沧桑正道与不堪与人道的诸种花絮，那至少是满足读者的好奇心。

然而，弄清母鸡们的真相又谈何容易？人都有吹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讳自己的走麦城的倾向。《草帽歌》里唱的“妈妈哟”是要杀掉自己的亲儿子的，目的是维护自身的光辉形象。江青的一些重要的迫害对象就是知道她的底细的人，这是一；社会在面对文本的时候早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谁是什么角色谁不是什么角色早已被人们派定，

叫做铁案如山，这是二；谁敢有不同的说法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是与人民为敌，就会遭到英勇捍卫定势者的堂皇反击。还有时尚，我们中国动不动搞风水轮流转，这是三；前几年热心革命的作家光荣伟大，过几年只有遗老遗少醉鬼性变态才吃得开；前几年三代贫农才吃得开，过几年却纷纷透露自己正是没落贵族的儿女，哪怕他的爹妈的唯一高贵证据是吸过一口鸦片。这样，人们根据时尚塑造出了各种作家类型典型形象，也是高贵的不容贬损，低贱的不容翻案，谁谁谁谁早就脸谱化了。最后还有是非，这是四；作家本是敏感和喜夸张的一群，文人相轻，自古已然，叫做老婆是人家的，文章是自己的，托尔斯泰还看不上莎士比亚呢，何况我辈俗物？再加上种种斗来斗去的运动，今天你代表正确路线，过两年我代表上了，那些个是非除了一风吹难道还有别的办法扯个明白？

所以，陈先生的文章也只是真实的版本之一种罢了，陈先生是以一种极大的善意敬意写这些离我们不远的作家们的，善人写，写得对象也善了起来可敬了起来。话又说回来了，不往善里写你往恶里写一下试试，光吃官司的危险也足以令作者吓退的。不全面是肯定的，不粉饰也不歪曲却是有把握的。所以，这是一本好书，好书要会写，还要会看。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本书中发见许多亲切的、却也是强大的直至可畏的真实，还可以想一想，有哪些真实可能是被有意无意地删略了？

俞平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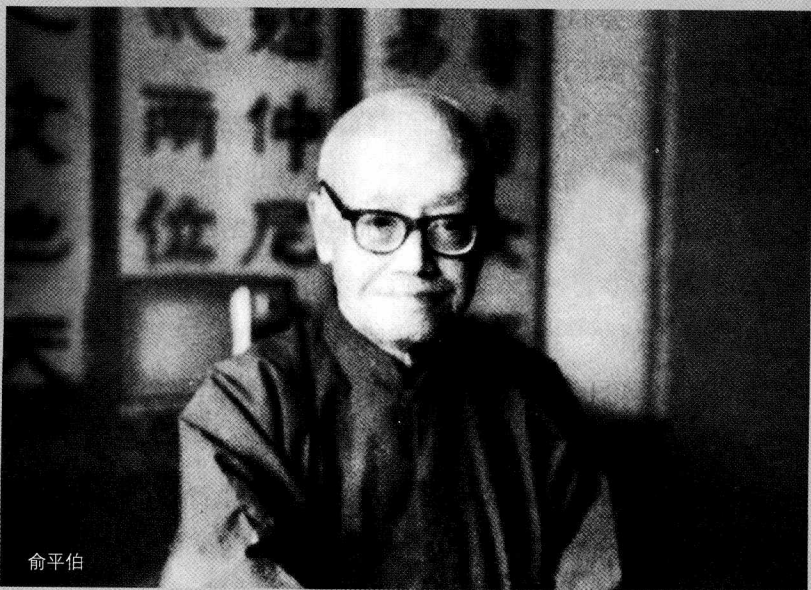
题记

在写俞平伯之前，认真读了俞先生的一些作品，他写于30年代的散文真是语词叠加、使用到极致，显示他对语言自如的操控能力，遇到合适的人与事，他的表述欲望都能超强发挥，一点儿没有浪费才情。再读他50年代写的思想检讨文章，似乎一下子丧失了与生俱来的写作天赋，语词发闷，语意飘零，靠拢主流而迟迟不得法。在20世纪的中国学者、作家中，我最感惋惜的就是俞平伯的语境退化，他仅有的十几年散文创作演化作几本别致的小书，竟成了他一生再也无法复制的“孤本”。

我很想找到俞先生的档案资料，试探能否从官方文件中解读他后半辈子的命运谜团。我通过原中国作协同事王素蓉的老父亲、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老书记王平凡老人的关系，从文学所方面突破，取得大力支持，辗转地把关

系接到社科院人事局。人事局研究后答应可以查阅俞先生的档案，但要我从所在的单位开介绍信，明确查阅者是党员身份。而我却是一名非党员，这确是难为我了，总不能为此火线入党一番。苦恼之际，跟部门领导一说，党员领导说这好办，把她的名字加上，再加上“党员”二字括号一下，把我的名字排在她的前面。我带着这样的介绍信前往接洽，很容易就蒙混过关了，让我回去等通知。

过了一段时间不见回复，我又打电话催问，人事局的同志笑着说：“不能急，要有一大堆领导签字同意才可以。”终于有一天通知前去查阅，我一早就赶到社科院大楼，人家还没上班我就堵在办公室门口。一阵查验之后，让我坐在一张桌子旁等候，过了一会儿，只见一位女同志抱着半米高、叠放的档案袋走过来，我一见心花怒放，笑脸相迎。女同志先细致地整理一遍，然后只拿出五六张发黄的档案纸给我，大都是俞先生当年手写的登记表。我不甘心地问：“下面的档案能让我看看吗？”女同志说：“不行，这都是俞平伯在政治运动中的材料，按规定你是不能查阅的……”我有点焦急，就问：“那我再找哪位领导签字同意一下？”女同志不急不慢地说：“你找谁都没用，政治运动档案多是揭发、批斗的东西，谁都不让看，谁签字都不管用……”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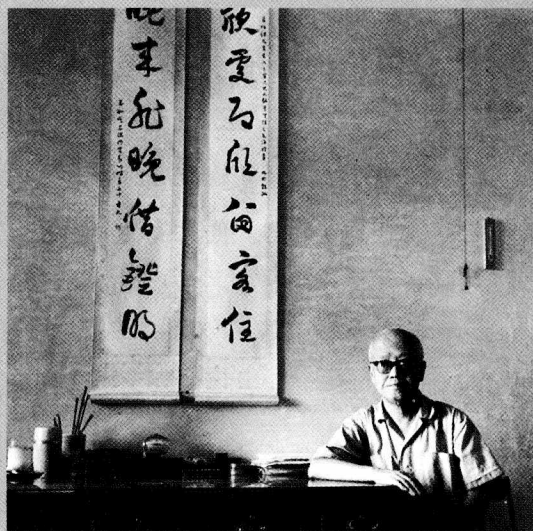
俞平伯

费了那么大劲，只能抄几页纸，而且多是俞先生自己填写的简易人事表格，无非是学历、特长、简历之类的内容。离开时我望着摆放在桌上那高高的档案袋，心中充满不舍和遗憾。我知道，俞先生纠结半生的坎坷命运都浓缩在这些发黄的纸片中，这些纸片是无语的，也是无助的，黏附着斗争的神秘信息而永远沉睡在纸袋里。

后来我采访了俞老的女儿、外孙，走访了三十多位文学研究所和曲社的众多老先生，几次受邀参加曲社的排练活动，从中感受俞老曾经有过的环境氛围。这些采访都颇具生动性，讲述本身就带有许多难得的历史信息碎片。但是我心里明白，缺少那些档案袋中历史纸片的内容，我们再来写政治运动之中的俞先生就觉得有些轻薄，更多的是一种写作上的不踏实、不完美。



俞平伯（中）与夫人（右）



俞平伯在书房。墙上的对联是1976年吴玉如书俞平伯自撰联：欣处即欣留客住，晚来非晚借灯明

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

在略为发黄的文管会《工作人员登记表》上，笔者见到俞平伯当年在“对工作意见及希望”一栏中填下的这几句话：“继续学习、努力，为新中国的建设，在政治、文化各方面服务。”此时是北平和平解放后的1949年6月16日，四十九岁的俞平伯身份为北大中文系教授。在1951年1月北大《教师及职员登记表》中，俞平伯如实地在“现在从事之研究工作”一栏中写了五个大字：整理《红楼梦》。

1952年俞平伯出版了《红楼梦研究》，引发了1954年一场来势凶猛的大批判运动。该书编辑、九十岁的文怀沙谈起当年，依然唏嘘而叹：

大约是1951年，有一天俞平伯因父亲去世等原因找我借钱，我答应帮助他从上海棠棣书店预支稿费旧币二百万元（新币二百元）。开棠棣书店的徐氏兄弟是鲁迅的同乡，书店的名字还是鲁迅改的。他们请我主编一套古典文学丛刊，我就同俞平伯商量：把二十七年前出的《红楼梦辨》再加新作，再出一次怎么样？俞平伯在旧作的黄纸上用红墨水删改，用浆糊、剪刀贴贴剪剪，弄成一本十三万字的书稿。徐氏兄弟是自负盈亏，担心《红楼梦辨》当年只印五百本，现在能否畅销。没想到销路很好，印了六版。据说喜欢《红楼梦》的毛泽东读后，

还把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找来，后来便把俞平伯补为全国人大代表。

这是福，也留下祸。1954年大批判时，《人民日报》唱红脸，把《文艺报》弄成黑脸，戏是毛泽东布置的，意在打开一个缺口，对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进行批判。

（1999年6月4日口述）

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在1954年11月5日内部大会上明确阐述了大批判的动机：“胡适是资产阶级中唯一比较大的学者，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可怜，没有多少学者，他是最有影响的。现在我们批判俞平伯，实际上是对他的老根胡适思想进行彻底地批判，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义……如果不找一个具体的对象，只是尖锐地提出问题，说有这种倾向、那种倾向，这样排列起来大家也不注意。现在具体提出《红楼梦》的研究来，斗争就可以展开了。”林默涵提到俞平伯时表示：“俞平伯是名人，把大家都吓倒了，因此就压迫了两个青年团员。”

林默涵在会上说：“俞平伯可以不作检讨，要坚持他的思想也有他的自由，不能就因此给他减薪或把他扣起来。”大批判并不像林默涵预料的那么平和，在《人民日报》等单位收集到的一些反映中，可以看到知识界陷入人人自危的不安状态。北大教授游国恩说：“太凶了，好厉害！”王瑶表示：“俞的观点有问题，领导上早就知道，何必现在搞他一下子呢！”吴组缃觉得俞平伯看了《光明日报》的文章会一笑置之，因为该文既肯定俞在考据上的成绩，又否定了俞的结论。周汝昌的批判文章把俞平伯与胡适并排谩骂，金岳霖说：“俞和胡应该分别看待，不然就会影响团结。”郑振铎在作协会上说：“林庚，你的问题也该搞搞吧！”林庚心里更觉不安。

处在漩涡中心的俞平伯自然成了有关方面观察的重点，具体情况层层上报：

俞平伯教授没有服气，自我解嘲地说：“我的书，这一来就一抢而光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又说，王佩璋批评我的文章，说是我叫她写的。她写的文章，还不是乔木叫她写的。

（《北京日报》办公室 1954 年 11 月 5 日编印《北大教授
对红楼梦问题的反应》）

俞平伯看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后，认为错误重点不是在他一人身上，《文艺报》和《文学遗产》都犯了错误，他们也将要作检讨。据余冠英谈，俞平伯准备要写检讨文章。

（《人民日报》文艺组《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反映》
第一号）

俞平伯本人此刻尚还在消极抵抗中，情绪当然是很激动、不安的，他说：“我豁出去了。”这即是说一切都听天由命。

（陈翔鹤《关于〈红楼梦〉座谈会的报告》）

1954 年 10 月 24 日，在中国作协会议室举行第一次《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从上午九点三十分一直开到下午六点三十分，扣去午餐休息两个小时，共持续七个小时。俞平伯打乱会议原定议程，首先站起来要求发言。他简述了研究《红楼梦》文章的发表情形之后，木讷地表示道：“我觉得自己思想是往前走的，这有历来讲演可证……我是从兴趣出发，不免就注意文章的鸡零狗碎。”会后，主持人陈翔鹤给作协党组的报告中对这段话评价道：其自处之道是颇为聪明的，因这样便可避免被别人揭发。事实上，俞平伯没有躲掉那些熟识的学者

作家揭发性的表态发言，整个会议的基调是一边倒。只有谈到考据问题时才有不同声音，吴恩裕认为：“李、蓝文章中并没有给考据以适当的地位。”浦江清表示：“他（俞平伯的考证）的劳绩我们是应该尊重的。”很快，这些话就被斥责为“同病相怜”。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曹道衡当年是《文学遗产》编委会秘书，他形容那时涌到编辑部的批判稿件似如挡不住的潮水：“稿子两三天就是一堆，不敢不看，还得仔细看，紧张得很。文章的观点基本一样，同意俞平伯文章的几乎没有。俞先生去反驳不大可能，但一些问题依然想不通，譬如，‘你们说贾宝玉是新人的萌芽，他踢丫环一脚，这怎么算新人？’‘说我是不可知论，可这里面就是有些弄不懂。’俞先生对大家的发言不是斤斤计较，老朋友也不是刺耳地骂他。”（1999年6月3日口述）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是俞平伯北大的同班同学，比俞大十岁。他派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孙承佩、副秘书长李毅来俞家劝说，当时的九三学社中央干部牟小东至今还记得许的苦心：

许德珩一直把俞平伯看作小弟弟，觉得俞在平静生活中没遇到暴风骤雨，怕他思想不通，怕他的对立情绪招来更激烈的围攻。九三学社沙滩支社基层成员大多是文化系统的人，开会帮助时也希望俞先生不要顶撞，要逆来顺受。

作为九三的中央委员，俞先生在九三学社的会上把检查同样念了一遍，念了有二三十分钟，有口吃。会议室里挤满了人。他自己说了“敝帚自珍”，我一直记住这句话。

（1999年5月19日口述）

俞平伯的自宅老君堂很快门可罗雀，同单位老友王伯祥悄悄地上门看望。王伯祥的儿子王湜华告诉笔者：“批得厉害时，俞老情绪低

落，压抑得厉害。父亲冒着风险看他，并邀他一起逛什刹海，在烤肉季小饮。父亲没说几句安慰话，却让俞老感动，拿出家传的好笺纸，写下‘交游寥落似晨星’这样颓废情调的诗句。”（1999年3月29日口述）

那时担任文学所总支书记的王平凡谈起那几年不平静的情形：

所长郑振铎当时有些紧张：“俞先生是我请来的，哎呀，没问题吗？”副所长何其芳请全所同志看俞先生的著作，看看究竟错在哪里。所里调子起得不高，不像社会上那么凶。何其芳在会上还说：“我们还没成他（俞）的俘虏，投降还说不上……批判俞先生的人，艺术鉴赏还不如俞。《红楼梦》后四十回让俞先生来续的话，比高鹗要好。”

俞先生的检查文章《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在《文艺报》发表，“文革”中有人说这篇文章是别人代笔，但俞先生对其内容是同意发表的。他承认自己是从旧社会来的，有旧思想的痕迹，也应有改造的任务。他没有反抗，接受这些也很自然。

1956年评职称，所里与北大、清华、中国科学院专家教授平衡，内部一致同意给俞先生定为一级研究员。何其芳、毛星和我三人研究后，让我找俞先生谈话。俞先生听后，平淡地表示：“我想，我是应该的。”何其芳向上面提出定级的两条理由，一是俞平伯有真才实学，二是有社会影响。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陈伯达对此表示同意，周总理也知道了。这两条意见使俞先生心里的一些疑问解决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学问的肯定。

定了职称，就可以到好医院看病，看电影能坐在前排，